

# 语言的底层问题

## 译文集

陈 伟 陈 鹏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语言研究室印

## 译 者 的 话

关于语言学中的底层理论问题，早在15世纪末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的学者阿思科里的著作问世，这一理论才广泛传播开来，受到许多西欧语言学家的重视，并且多次在国际语言科学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和研究。1955年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召开了学术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一理论问题，并为此出了专辑。本译文集就是根据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报告与通讯》1956年第9期译出的。

我们在这本译文集中共收了三个主要报告、开幕词、讨论总结和一篇书面发言的摘要。这些译文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完稿，后因故未能发表。考虑到过去在我国对这一理论介绍得不够，熟悉的人并不太多，而这些论文对于我们了解“语言底层”的理论概念和分析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后果，对我们研究语言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都有可供参考之处，因此，经过重新校阅，发表出来，希望能对我国的语言研究工作多少有点用处。

本译文集所收之译文，除《底层理论发展史中的某些问题》一文为陈鹏译外，余均为陈伟译。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请读者同志们给予指正。

## 目 录

|               |                   |
|---------------|-------------------|
| 开幕词           | В.И. 鲍尔科夫斯基 (1)   |
| 语言学史中的底层理论    | В.Н. 雅尔采娃 (6)     |
| 底层问题          | Б.А. 谢列布连尼柯夫 (41) |
| 论语言的底层        | В.И. 阿巴耶夫 (76)    |
| 底层理论发展史中的某些问题 | М.Я. 涅米洛夫斯基 (95)  |
| 讨论总结          | Б.В. 哥尔龙格 (103)   |

# 开 幕 词

В.И. 鲍尔科夫斯基

敬爱的同志们！

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认为，在我国最大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列宁格勒举行公开的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底层 (субстрат) 的理论问题，是合适的。

语言学研究所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相互影响的理解而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列宁格勒将能顺利地得到讨论。大家都已知道，在语言融合的情况下，通常总是其中的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着自己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并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而另一种语言则逐渐丧失其特性，逐步衰亡。

而由于在苏联的语言学家中曾经广泛地流传过马尔在语言融合方面的错误观点，所以这次的讨论就更为必要。这样的错误观点，如所周知，不但是马尔有，国外的语言学界中(Г. 舒哈尔特、Н. 特鲁别兹柯伊、Э. 法列尔)也有。

毫无疑问，在语言学家们澄清和阐明许多问题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将一定能给予巨大的帮助；反之，在他们研究一定地区的居民更替的后果以及民族同化等等问题时，底层理论对他们也是有意义的。

语言学家只有在相邻学科的学者帮助下，他的某些假设才能获得实际的根据，或者是被推翻掉。没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研究工作，底层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所谓底层，我们是把它广义地理解为“战胜语言中所吸收的“战败”语言成分。”

至于这些成分在战胜语言体系内部是否自成“体系”，或者它们从来就是被“胜利”的语言体系个别驯化了的、零散的借入成分，这仍然还是争论未决的问题。

在现代的国外语言学著作中，有三个术语被一些持有不同于马尔观点的并认为一种语言必然胜利的作者所接受，它们是：

(1) 底层 “субстрат” [阿思科里 (Асколи) 从80年代起使用]——“战败”语言的成分，所谓“战败”语言是指掌握了外来者语言的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

我们可以提出拉丁语在高卢和西班牙的胜利，斯拉夫语在巴尔干和捷克的胜利，突厥语在楚瓦什的胜利等来作为例证；

(2) 表层 “суперстрат” [瓦尔特布尔克 (вартбург) 1936年提出的术语]——外来者的语言成分，这种外来者的语言已融合到当地居民的语言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的语言则成为“战胜”语言。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法朗克人在罗马化了的高卢，诺尔曼人在英格兰，保加利亚突厥人在保加利亚的情况；

(3) 叠层 “адстрат” [巴尔脱里 (Бортоли) 1939年提出的术语]——异族语言的成分，它们是在边界地区，在部分人种混合的情况下进入语言中的，并由此流传到整个地区（如：白俄罗斯—立陶宛，立陶宛—波兰，斯洛文—意大利等边界地区的语言关系）。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区分这三个概念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这三种类型的语言相互影响在语言方面造成的后果是否有区别？这正是有待于讨论总结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争论最大的是第三个术语（адстрат叠层），以及我们还没有指出的第四个术语——边界接触（маргинальное контактирование）——后者意味着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是在没有任何人种混合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边界接触与叠层不同之处）。

关于上述几种概念之间的区别问题，是属于尚未研究透彻的一个问题；同样地，引起一种语言“战胜”另一语言的语言外部因素（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及语言内部因素（相近的程度、亲属关系、统一的程度、规范化）的问题，也是如此。

“战败”语言衰亡过程的阶段问题，也属于这类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之列。除了国外发表过有数几篇著作外，我们能提出的仅有 Ю. П. 捷舍里也夫的《论原先已有文字的语 言、新有文字的语 言和无文字的语 言……的相互影响》一篇，这篇文章试图用高加索的语言材料来解决这一问题。

无论是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在 В. А. 谢列布连尼柯夫或 В. С. 拉斯脱尔古也娃的文章中，都提出语言的各个方面，其稳定性程度是不同的问题。

更加准确地阐明这一问题也是这次讨论的任务，而关于词法几乎完全不可渗透的一些结论就包括在这个问题之内。

讨论会的基本的和中心问题是：那种与人种混合无关的语言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语言后果同由于广义的底层（底层、表层、叠层）影响而产生的后果，两者有无差别？差别何在？

我们即将讨论的 В. А. 谢列布连尼柯夫和 В. И. 阿巴耶夫的报告就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观点。

而对于既发生人种混合又产生语言间相互影响这样情况下的双重语言制的作用，则应当给以更加详细的说明，也就是说：

(1) 在相当数量的居民并未彻底掌握两种语言的情况下，是否能有底层（表层）的影响？在尚未充分掌握另一语言或只有少数居民操双重语言的情况下，可否有这种影响存在？

由于对苏联各民族语言所进行的研究，因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

(2) 根据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许多条件来看，操双重语言时期的长短如何？

(3) 在双重语言停止使用以后，底层是否还起作用？即“战败”语言能否保持和在什么范围内保持其言语习惯和发音基础？同时，渗入到语言内的句法结构还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呢？等等。

(4) 地名学是近年来几乎被遗忘了的一个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Я.М.艾捷林，К.К.柴鲁伊卡，А.И.波波夫尚在研究，但在解决底层问题方面，地名学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战胜”语言受到底层影响的情况下，关于语言各个不同方面（不同的词汇层、语音、构词法、词形变化、词组类型、简单句和复合句的结构，等等）的可渗透性的程度问题是应该给以更加明确的阐述的。

而关于底层理论是否已越出历史比较法的范围，或者它只是历史比较法在运用上的一种特殊情况，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В.А.谢列布连尼柯夫和В.И.阿巴耶夫两位的报告对这一问题也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上述所要讨论的问题在В.Н.雅尔采娃、В.А.谢列布连尼

柯夫和B.И.阿巴耶夫三人的主要报告和 A.Б.捷斯尼茨卡雅、B.Г.奥尔洛娃和 E.И.乌布良托娃各个事前有准备的发言中不可能全都得到充分的阐明。

我们期望，无论是在前述报告和发言中将要阐述的问题，或者是尚未引起应有注意的问题，都能得到富有成果的讨论。

请允许我号召出席会议的语言学家们、考古学家们、人类学家们、民族学家们广泛地、自由地交换意见，进行战斗式的批评，大胆深刻地解决所要讨论的问题。

# 语言学史中的底层理论

В. Н. 雅尔采娃

## 1

早在19世纪末叶，许多语言学著作中就已提出了语言混合的思想。这些著作主要涉及的是两个问题：(1)从某些语言历史上反映出来的产生语言间影响的条件和结果；(2)某些语言或某些语群的起源，以及与此相关的偏离母语类型的现象。由于借词的划分一方面涉及到建立一些语言的具体历史的任务，另一方面又与语源学研究有关，因而往往使得对语言间联系问题的深入研究主要局限于词汇外来成分的问题上。根据19世纪一些语言学家，如温狄士(Виндич)<sup>①</sup>或格柳恩巴乌姆(Грюнбаум)<sup>②</sup>等人的意见，如果一个语言中有大量的借词，借词的百分比很高，就可能使这个语言变为“混合语”。

格柳恩巴乌姆列举了具有各种不同词汇起源的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做为混合语的例证，并正确地指出：借

---

① E. Windisch, Zur Theorie der Mischsprachen und Lehnwörter „Berichte der Sächsischen Gesellsch. d. Wissensch“, Bd. 49. Leipzig. 1897.

② M. Grünbaum, Mischsprachen und Sprachmischungen. Berlin, 1885.

词的性质表明两种语言之间在借用时的关系；因而，也表明了这两种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他列举西班牙语借用阿拉伯词为证，说明借词意义在新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些借入词不仅保留着自己的基本意义（即使该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来就是多义词），而且还构成派生词和派生意义。

但是，格柳恩巴乌姆对于借词和本族语词在一个语言的词汇体系内结合时的关系，它们的意义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意义的进一步发展却没有进行分析。把语言混合的问题归结为该语言的词汇起源上的混合问题，这就阻碍了对问题的深入和细致地解释。由于他是以反历史的态度对待所研究的现象，并且对于语言的融合过程（提出 *mischsprache* “混合语”概念）理解得不正确，因而不能对语言的词汇部分及其发展进行有成效的研究，术语也不够精确：“底层”的概念与比较一般化的语言相互影响的概念交混在一起，为解释“底层”影响，却列举了简单借用现象的事实。19世纪的语言学家们虽然对于词汇事实特别关注，但对这个综合性的问题没能提出明确的概念。

苏哈尔特(Г. Шухарт)<sup>①</sup>认为语言的词汇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对它的看法也非常独特。例如，苏哈尔特一方面指出了在阿尔萨斯语中有大量的德语借词存在，另一方面又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认为这种现象是德语词汇的“胜利”标志，表明法语在阿尔萨斯语中留下的只是法语语法，而阿尔萨斯语的词汇则全是德语的；或者相反，认为阿尔萨斯语中的这些德语词是法语“俘虏”来的。在谈到解决这种问题的困难时，苏哈尔特断言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同一个地方，在同样条件下进行着‘斗争’的两个语言，哪个语言能更多地从另一语言

<sup>①</sup> H. Schuchardt, «Das Französische im neuen Deutschen Reich», 收于苏哈尔特著《Romanisches und Keltisches》(Straßburg, 1886)一书中。

中吸收词汇，那个语言就将是‘胜利者’，因为它‘征服’了词汇更古板、结构更严谨的语言。”因此，按照苏哈尔特的意见，大量的借词并不损害语言，也不破坏它的完整性。在与别的语言相接触中，吸收了大量外语词的语言就会借助这另一种语言丰富起来。

利用词汇来论证底层影响的作法，在以地理名称为材料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类著作中有两种研究方法：(1)力图把词汇体系的“脱漏现象”归于底层，但没阐明这个底层结构本身；(2)力图确定出底层的民族属性和语言属性。

在许多语言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对地理术语的分析，并且解释为前印欧语底层的残余物。这可以引证乌切尔(Уртель)<sup>①</sup>论述法国南部土语中“伊比里亚”成分的著作为例。著者根据吉尔也龙(Жильерон)地图集的材料，研究法国南部土语中他认为与巴斯克语词汇在词法结构或意义上相似的成分。但作者并没有对所描述的现象提出解释，甚至也没有说明他所列举的词是巴斯克底层的残余，或仅仅是从相邻的巴斯克人那儿得来的借词。作者一方面引用了大量不同方面的实际词汇材料（例如“左的”，“醉汉”，“麻雀”，“青虫”，“罂粟花”，“蜥蜴”，“小李子”），同时还引用很多该地区的地理名称。他还罗列了一些他认为是仿译的词。他认为这些词的内部形式与巴斯克语的形式相似。

胡伯什米德(Хубшмид)<sup>②</sup>在不久前出版的一部论述撒丁语

---

① H. Urtel, Zum Iberischen in Südfrankreich, «Sitz.-Ber. d. K. Preuss. Acad. d. Wissensch.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17.

② J. Hubschmid, Sardische Studien, Das mediterrane Substrat des Sardischen, seine Beziehungen zum Berberischen und Baskischen, sowie zum eurafrikanischen und hispano-kaukasischen Substrat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 Bern, 1953.

里地中海底层的著作中用的也是这种研究方法。他对于那些可能属于前罗马层的词汇的历史分别进行了研究。从语义学来看，这些词群是各式各样的：有植物、动物、肢体的名称，地势的名称，还有某些带非罗曼词缀（作者认为）的词。胡伯什米德试图把这些前罗曼成分归入各种不同的语言：柏伯尔语，巴斯克语，高加索语。但是，著者忽视了在上述地区各种不同语言间可能发生互相影响的历史条件；同样地，著者对相互影响的语言也忽视了对它们的成分进行结构分析。

从研究方法来看，我们觉得别尔托里第（Бертольд）<sup>①</sup>研究“阿尔卑斯词”ganda的著作是比较更为成功的。这个词流行于阿尔卑斯境内的部分地区，没有印欧语源。别尔托里第力图阐明，在何种条件下不同语言的词汇对比可以提供说明它们共同起源的论据。他提出了下列几个问题：（1）ganda这个词流传的区域是否已超出它经常出现的阿尔卑斯地区范围之外？（2）为了查明出现这个词的历史根据，是否能够找到一些很久以前的、足以做为论证的词？（3）在论述所研究的词汇时，如何才能避免同音词偶合的危险？（4）如果对语音和形式的分析能够证实ganda一词不是印欧语系的词，那么把它列入何种前印欧语的语言学底层呢？

别尔托里第在他的著作中，根据研究这一术语的内容所作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在由阿尔卑斯到比利牛斯广阔的地带内，ganda一词的各个意义——“石头堆”、“多石的河床”和“多石的田地”出现的次数多寡不一。别尔托里第在审查他所选择的词汇的语音材料时指出，这些语音材料与通常被解释为伊比里

---

<sup>①</sup> V. Bertoldi, Problèmes de substrat., Bull de la Soc.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1931, p. 93—94.

亚地方前印欧底层影响的那些变化现象是相符合的(例如, f 转变为h)。

如果能够从一个历史上得到证实的民族或部族那里为上述现象找出语言学的和民族学的底层来, 那么解释这种底层却是更为复杂的工作。慎重的研究者总是避免使他们所发现的非印欧语的词汇成分带有局限性。在这方面, 表面上的对比研究确实会得出荒诞无稽的结论。

研究方法的不严密是会导致得出无根据的和仓促的结论的, 这从1936年召开的关于古希腊语和其它巴尔干语言中的底层问题的第四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 扬·万·奇涅金(Я. ван-Гиннекен)的发言中就可找到实例。他一方面反对桑德费尔德(K. Сандфельд)、特鲁别茨基(Н. Трубецкий)和其他语言学家用巴尔干诸语言之间的近似现象解释所谓“巴尔干化”的作法, 另方面又把巴尔干诸语言的共同特点完全看成是它们的统一底层的残余。他指出, 通常在某些巴尔干语言中可以列举出将近150个共同的特点, 其中大约有20个特别重要。巴尔干诸语言的这20个特点(而其余的130个中还有将近100个)在“古卡特维尔”语(пракартвельский)中也可以遇到。古格鲁吉亚语, 明格列尔语(мингрельский), 拉兹语(昌语)和斯万语就是从这种古卡特维尔语发展来的。扬·万·奇涅金指出, 荷马(Гомер)所保留的第一个色雷斯词Θάμυρτος, 在高加索就很流行, 而фракрах和地图上的部落名称一样。他认为色雷斯人就是卡特维尔人(居住于外高加索的数种民族之总称——译者), 他们的语言是巴尔干诸语言的底层。扬·万·奇涅金的毫无语言学根据和缺乏历史——民族学论据的结论受到了第四届语言学家会议与会者的剧烈反对。但是在许多语言中探寻地中海底层的研究工作, 直到现在有时还带有这种性质。

在观察语言混合事实的同时，也产生了关于语言接触的条件和决定这一过程的历史背景的问题。所以早在19世纪末叶的一些著作中，就有想把语言混合的类型确定下来的尝试，并希望一劳永逸地制定出一种固定的公式，把所发现的一切事实都列入进去。

因此赫姆尔(Хемпл)<sup>①</sup>的著作曾受到很大的欢迎，许多西欧学者都把他的著作作为依据。赫姆尔以文化高低之间和人口数目多寡之间的比例做基础，分析民族混合过程中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及这些因素对语言分化的影响。他确定出下列各种类型。(I)胜利者是一个成为统治阶级的比较小的集团，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强迫推行自己的语言，然而人口数量不够；他们的孩子却学习了土著人民的语言，结果在赋予被战胜居民的语言以一些有关管理、军队、法院等的术语后，胜利者的语言逐渐消亡了(例如：法国的诺尔曼人和在英国的法兰西人)。(II)：(1)胜利者是以庞大的队伍侵入的，并携带家眷；他们组成了统治阶级和中等阶级，乃至部分下层阶级；在外来者的进攻下土著人民退让了，或者变成外来者的奴隶；被征服居民的语言被看成是低等语言，它很快就消亡了，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地理名称(例如：不列颠的盎格鲁人和撒格逊人与克勒特人的关系)。(2)强的民族战胜了另外一个民族并占领了他们的领土，变之为殖民地；如果久而久之这个殖民地还继续处在宗主国的直接

<sup>①</sup> G. Hempl. Language rivalry and speech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ase of racemix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XXV, 1898.

影响下，它的居民就会越来越广泛地仿效这个宗主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例如：罗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Ⅲ）外来移民是在不同时期分批迁入的；他们成为仆役或一般只担任平凡的职务；如果他们能更好地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们就能更快地在这个国家就业；所以他们被彻底地同化，他们甚至可能成为组成新民族的大部分，然而实际上他们的语言不能给与这个国家的语言以任何的影响（例如美国的外来移民的情况）。

奥尔切里则特别强调数量上的对比关系。他写道：“如果使用的人数相当少，那么任何外来语都不会保留下来。”<sup>①</sup>

谢斯(Сейс)认为：“在社会压力由于胜利，或由于私人的利益，或由于某种其它的原因，因而相当强大的地方，低等民族就一定会采用高等民族的语言。”<sup>②</sup>

拉特采尔(Ратцель)<sup>③</sup>则描写了其它能够导致一个语言取代另一语言的几种民族冲突形式。他指出，在有史时代，我们观察到的似乎是“有计划的”、企业形式的征服和殖民化。但是不能这样来推断前历史时期的欧洲。在前历史时期，没有预定目标的移居乃是典型的特征，例如在苏丹就曾经出现过这种移居情况。当时非洲的富尔贝部落的居民，一般都作为贫穷的放牧者逐渐渗入一国的国土，并逐渐影响土著居民，从而变成这个国家事实上的主人。拉特采尔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渗透”

---

① H. Oertel,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1902, p. 253.

② A. H. Sayce, *Principes de philologie comparée*. Trad. française, Paris, 1893, p. 134.

③ F. Ratzel, *Der Ursprung und das Wandern der völker geographisch betrachtet*, „Bericht d. Sächs. Gesellsch. d. wissenschaft“, Bd. 50, 1898.

(Durchdringung), 并且推断说, 在文明社会的相同阶段上, 世界各地都曾有过类似的过程。在新石器时期, 大约发生过印欧人最早期的侵略, 欧洲的原始居民曾像外来者一样地移动过, 这些外来者不但可以找到很多办法来渗透, 而且可以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找到大片的无人居住地带。奥尔切里接受了拉特采尔的这些原理, 并且认为, 这些都是形成部落间语言 (contact languages) 极好的条件, 卡别连茨 (Габеленц) 也把这种像是派生的语言称之为“结合语” (Kontaktsprachen)。这种语言基本上是外来部落和土著部落之间的交际手段。当然, 在这种语言中具有很多地方方言的痕迹, 但是后来它却能获得唯一共同语的权利。

总之, 我们看到的是某些研究者如何利用实际内容根本不同的历史事实进行对照比较, 从而对历史做出肤浅而公式化的分析。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期, 仅仅因为他们都是“侵略者”, 就被说成是具有同样的状况。像赫姆尔那样, 企图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制定成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公式, 这种做法本身就表明对具体历史实际缺乏了解。所有的研究者对语言的完全更换一般都由政治原因而引起这一点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西欧的科学界在把实际的历史分析与语言事实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上却显得无能为力。

### 3

在 20 世纪的语言学中出现了一种力图把语言相互影响的“非语言学”条件与语言结构问题分割开来的倾向。如, 马丁内 (Мартине) 写道: “一个语言之所以‘战胜’自己的‘敌手’, 并非由于其天生的禀赋, 而是因为它属于某个更雄强有力的、文

化更高的、更富于进取精神或更富有生殖力的集体。”<sup>①</sup>诚然，马尔丁内也进一步指出，如果语言传播的本身不能提出足以使语言学这门独特的科学感兴趣的现象；那么这种传播的全部后果就一定会影响到正在传播着的语言，也同样会影响到与传播着的语言相冲突的那些语言。

但是，近年来西欧的一些著作中，对于两种语言相互冲突的历史条件却完全不予研究，转而研究“纯粹的”语言系统的相互关系。温拉赫(Вайнрайх)的最新著作<sup>②</sup>即可为证。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虽然也指出存在着传播双重语言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条件，但是他的目的却在于表明：“两种相互冲突语言的结构对于语言混合过程具有多么巨大的决定作用，而这却是同建立在语言冲突的社会—文化条件基础的非语言事实相对立的。”

温拉赫对语言的各个方面——语音、语法和词汇依次作了研究，他以同样的方法来分析输入新成分时语言体系中旧成分的更替和被排挤的各种情况，并细心地把这些问题与“非语言条件”区别开。显然，在持有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下，语言就被看成为各种内部对比关系的纯粹抽象的死公式，正如同温拉赫自己讲的那样，对于研究的目的来说，所取的两种体系是否将是“两种语言”，或是“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或是“同一个方言的不同变体”，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抽掉混合现象的数量方面，那么不论是谈论法语和汉语之间的接触，或者谈论两个邻居所使用的英语变体之间的接触都同样是机械的。按照温拉赫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意见，在非语言因素中心理因素具有

① A. Martinet. Diffusion of language and structural linguistics. „Romance philology“, vol. 6. №1. 1952.p.5.

② U. Weinreich. Languages in contact. New York, 1953.